

宁树藩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Ning Shufan

探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脉络
追溯近现代中国报业历程
分析新闻学理论的经典论著

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

「史论篇」

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史论篇」
宁树藩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Ning Shufan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树藩文集/宁树藩著.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3.10 ISBN 7-81036-675-0

I. 宁... II. 宁... III. 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国—

IV. G21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2979 号

宁树藩文集

作 者: 宁树藩著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叶思源

封面设计: 郭 炜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州市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邮购通讯: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花园祥龙阁 2205 室

电 话: 020-85250482 邮编 510075

开 本: 890×1168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69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版

印 数: 3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ISBN 7-81036-675-0/G·142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长江新闻与传播系列丛书

总编 陈婉莹

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 院长

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 教授 总监

[史论篇] 编辑委员会

主编 卓南生（新加坡）

日本龙谷大学 教授

程曼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编委 胡兴荣 [马来西亚]

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

钱 刚

作家、资深记者

赵丽国

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中心 副教授

长江新闻传播丛书 总序

新世纪之初，中国新闻界面临空前机遇，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提升，正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迈进，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传媒生态，而刚结束的 SARS 风暴危机又赋予了中国媒体更强烈的新闻使命。在全球化、数码化、信息化的时代浪潮中，中国新闻业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要深化改革，发展自己的道路、特色与方向，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中诞生的。

1981 年，知名企业家李嘉诚先生在家乡汕头创办了汕头大学：2000 年，汕大成立新闻系；2003 年初，汕大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下，又成立了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创办之始，就倡导教学与研究并重，并且成立出版部门以配合教学与科研，在汕大出版社协助之下策划“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重点出版新闻史论和新闻实务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另将逐步推出传媒译丛，引进国际新闻传播经典著作与工具书，以体现学院实务与理论并重的办学理念。

史学与理论乃学科之基础，故丛书以“史论篇”为核心，其中又首先出版当代新闻史大师方汉奇教授和宁树藩教授的个人文集。方、宁二师是中国新闻学界的权威，专著给汕大出版，反映他们对年轻的长江新闻及传播学院，以及新一代学者的期许。我们在此将方、宁二师的著作呈献给所有关心中国新闻学术发展的朋友，作为本丛书给读者的见面礼。

两师桃李满天下，对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卓著，治学严谨，对学问执着追求。他们在文集序言和后记中，不约而同道出了学人的肺腑之言，为后学树立佳模：“发现是没有止境的，探索也是没有止境的”（方汉奇语）、“此生不止，探索不已”（宁树藩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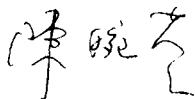
另外，新闻改革必须植根于民族与文化的传统，在历史长河中寻回中国新闻学的精神和源头。只有了解百多年以来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坎坷和盛衰，才能洞悉现在，掌握未来。方、宁两师见证了半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起伏，文集涵盖中国新闻史研究之全貌。我们对中国新闻事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先启后，责无旁贷。

“国际本土化”、“本土国际化”是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追求。中国新闻传媒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既要保持本土特色，又要与国际接轨，争取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新时代呼唤新思考、新理念。在探索独具特色的发展途径的同时，诚望“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能成为国内外教育机构及新闻媒体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为中国新闻媒体的改革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李嘉诚基金会对本丛书的赞助，更代表了基金会对教育事业的一贯承担，谨此致以谢意。

年轻的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也容许我们采用国际传媒教育的先进模式，以高起点、国际化的定位参与国内新闻教育事业。我们相信，中国新闻教育还必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术理论，进而指导新闻实践。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陈晓莉' (Chen Xiaoli), the name of the Dean of the Yangtze Rive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2003年10月于北京

宁树藩简历

宁树藩，安徽青阳县人，1920年10月生。1941年就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194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文系。1949年11月起任教复旦大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1955年调该校新闻系（现新闻学院），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研工作，近年来兼治新闻理论。1985年评为教授，次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合著有新中国最早新闻史教材之一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我国第一部新闻学辞书《新闻学词典》和《新闻学基础》。任《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的副主编，其现代卷的主编。主持国家研究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曾参加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评议工作。曾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1991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1年离休，返聘至1997年。

目 录

总 序	陈婉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 (民主革命时期)	(1)
迈向灿烂明天的历史思考	
——纪念中国共产党党报八十周年	(40)
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初探	(56)
中国新闻记者的战斗历程	
——夏林根主编《近代中国名记者》导言	(75)
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	(92)
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	(108)
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其与传播学的关系	(136)
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	(147)
关于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科研工作加速学科建设问题	(158)
编写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几点意见	(164)
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71)
我国的报纸副刊是怎样诞生的	(194)
福开森控制下的《新闻报》	(198)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205)
严复的政论、办报和译书活动	(210)
陈独秀与《新青年》	(229)
蔡和森与《向导》	(241)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评述	(256)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评述	(269)
梁启超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	(285)
评《开智论》	(296)
陈独秀与《向导》	(309)
怎样评价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	(320)
史量才的成功之路	(334)
怀念汪英宾教授	
——兼论他的《中国报刊的兴起》	(341)
十九世纪香港报业概述	(349)
关于“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	(356)
发扬优点 继续开拓	
——纪念《新闻研究资料》创刊五周年	(365)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评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370)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序	(373)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序	(375)
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序	(380)
新加坡人对中国报业史研究的新突破	
——喜读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383)
上海新闻事业知识的宝库	
——评《上海新闻志》	(393)
马光仁主编《上海当代新闻史》序	(396)
新闻学研究中亟待澄清的几个问题	(400)
党报应该重视“读者需要”	
——重读王中同志关于“读者需要”的论述	(409)
论新闻的特性	(417)
新闻定义新探	(428)
松本君平与《新闻学》	(436)

“有闻必录”考	(441)
裘正义《大众传媒与中国乡村发展》序	(457)
黄旦《新闻传播学》序	(460)
桑义麟《新闻报道学》序	(463)
唐惠虎《舆论监督论》序	(469)
王益民《系统·比较理论新闻学(讲稿)》序	(473)
新闻学园地里的耀眼新葩	
——《传媒角色论：新闻传媒角色与个性风格》一书读后	(477)

访谈录

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	(481)
强化本体意识，探索自身规律	
——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496)

附录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回忆	
——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	(505)
《中国报学史》史料订误	(513)

后记

此生不息 探索不已	(4)
-----------------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

(民主革命时期)

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进行改造，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过去曾有些同志对这项研究做出过不小贡献，但是，将其置于历史发展中加以系统考察，则是一新的课题。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自量难以胜任，而且也非一篇文章能把问题讲清楚。这里，只是提出一些粗略的看法，以供商讨，旨在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如有更多的同志开展这项研究，那就很好了。

本文探索的时间范围限在民主革命时期，并按历史顺序，分以下阶段进行论述：

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当马克思还活着的时候，中文书刊上还没出现过马克思的名字。直至 19 世纪的最后一年，才在一家外国人办的报刊《万国公报》(1899 年 2 月)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称他为“百工领袖”，称他的学说为“安民新学”。当然，这种点滴介绍，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说有什么影响。到 20 世纪初期，在一批奔赴国外(主要是日本)寻求救国道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曾经兴起一股小小的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曾不同程度地被介绍过来。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注意，可以说是在这个潮流中开始的。当时，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或是稍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仍隶属资产阶级革命派)，各自从不同的意图出发，都曾



在自己所出版的书刊中多次谈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主张，涉及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领域的问题，《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某些内容，则在1903年第一次被译介与中国读者见面。^①中文书刊之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办报活动，也就始于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上海广智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福井准造原著，赵必振译），简介了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新莱茵报》和投稿《纽约论坛报》的活动，这也许是中文书刊中关于马克思与报纸关系的最早记载。以后续有介绍，但均未触及马克思的办报思想。

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虽曾表现出某种同情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介绍马克思的活动及其片断学说，或者是简单为了“牖新知”、“广见闻”的需要（如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者只为自己的思想主张寻求借鉴（如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问题与改造社会的工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自然，这个时候也就不可能出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办报的现象。

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头脑——主观世界，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向西方文明寻找救国方案的企图破产。俄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很快，一股介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南到北一下澎湃起来了。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将这一潮流汇集为一种改造中国的巨大力量。从此，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在这个时候，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一种新型的报刊破土而出。它一出现，就以新的装束、新的姿态，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战斗。这种报刊主要是共产党主办的报刊以及在党领

① 见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中译本一文。

导下的青年团报刊以及工农等群众性报刊（当然也包括某些为数众多由共产党员主持编务的国共合作出版的报刊）。如果说，开始时只有寥寥数种，可是到大革命失败前已出版有近 300 种之多，可以说是一支颇为壮观的新闻大军了。

这些报刊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之下开始成长起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新闻界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关于报刊观念的变化。集中的是关于报纸的阶级性问题；阶级观念被引进到新闻事业的领域来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办的报刊，无不确认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有的公开做了申明（如《新青年》季刊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罗针”）^①，有的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向读者讲明这一点（如《中国青年》等），但实际上也都是这样认识的。同时，革命的人们也广泛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种种新闻现象，指出某某报为资产阶级报纸，断言资产阶级的报纸和他们的法律一样，“是对付工人阶级的工具”^②，批评了报纸是所谓社会舆论代表等“超阶级”的口号。

如果包括在华外报，中国出版报刊到那时已有百年历史了。在五四以前这整百年的岁月里，有谁会吧“报纸”和“阶级”联系起来呢？人们至多承认自己的报纸的党派性，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报纸的阶级性；人们可以对反动报纸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却从没有一个人对它的阶级性进行揭发。

事实表明：一种从未有过的把报刊看作是一定阶级舆论工具的新观念出现了，它与那种认为报刊是社会公众舆论机关的传统观念对立起来，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头脑。在后人看来，也许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很平常的变化。但是，这是一种至为深刻的变化。新闻战线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一系列革命，与此紧密相连。

对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认识，也由此出现了一种根本的变革，在此以前，几乎整个进步新闻界，都把这种自由看成是绝对

① 《新青年之新宣言》，载《新青年》季刊创刊号。

② 江因：《无产阶级的战术》，载《平民之友》第 15 期，1924 年 9 月 19 日。

的永恒的原则加以崇奉，不少人表示要毕生为之奋斗，求其实现。他们虽曾激烈地抨击一些反动报刊，但并不反对它们存在的权利；他们虽曾对一些反动言论表现出满腔义愤，但又认为报刊发表这些言论，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又因为他们把言论出版自由看成绝对的永恒的原则（这必然成了脱离阶级内容的抽象原则），而他们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往往成了争取立法条文的斗争。这种观念是相当牢固的，到了北伐战争时期，著名的进步报人戈公振在谈到言论出版自由时，所提出的主张还是“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①。这种绝对自由观点，当时从总的方面看，在政治上有很大积极意义；然而它是不科学的，其政治上消极的一面也在不断表露出来。

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如此牢固的传统观念，被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影响的先进分子）一下冲破了。他们认为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是有强烈阶级性的，它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就只有统治阶级出版报刊欺骗人民的自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因此，中国人民必须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②他们进一步指出，在人民政权的统治下，也决不会给反动派以言论自由，在那里，“言论只能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要给他剥掉，和以前恰恰相反。”^③陈独秀的转变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原是一个言论绝对自由原则的信奉者，可是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很快变化了。他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的广州政府，对《时事新报》、《新申报》、《顺天时报》等反动报纸的禁售，他说“民权自由若为这些报纸而设，还有什么价值？”^④短短几年，前后判若两人。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六章第十七节。

② 参阅《言论界之不平鸣》（《向导》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五一”劳动节与农民》（《中国工人》第五期）、《南洋烟厂罢工中上海报刊之原形》、《向导》第八十四期）、《向导周报与劳动阶级》（《中国工人》第三期）等文。

③ 《向左还是向右》（润），载《政治周报》第二期。

④ 《“反国民革命者”的民权呼声》（实），《向导》第一七五期。

党报宣传应当遵循党的原则和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党保持一致，这是报纸观念的又一巨变。中国共产党自它诞生的时候起，就规定“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①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还对违反这一原则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共青团中央也做出类似的决定，要求“各地刊物所发表之意见，应严格求与中央刊物态度一致”^②，并指明团的宣传工作应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为了推动这些原则的贯彻，党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党中央对所出版的报刊和宣传进行监督的制度，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党报宣传工作，经常印发宣传大纲以统一宣传口径，等等。党还根据这种原则精神，对原来混乱不堪的国民党报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影响是广泛的，很多进步的新闻记者曾主动提出“统一宣传”的要求^③。

报刊宣传上这种统一性组织原则，在中国报刊史上实属首创。在此以前，商业报纸不用说了，政党报纸中也不曾有过。不错，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政党，都曾表达过要统一本党报刊宣传的某种企图。但是，由于思想庞杂、组织松散，根本无法做到。因此，也就没有作为一种原则加以确立，广大报刊工作人员的头脑中，就更不会产生这种观念了。

报刊观念还有一重大变化，就是把党的报刊看成是指导和组织群众实际斗争的工具。《向导》周报宣称：“本报是有组织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象别的报纸一样，只是空发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个同志依着进行的。”^④团中央也要求团刊“代表本团指导青年进行各种民众运动”^⑤，还明确指出团的刊物应有两种作

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决议》（1921年）。

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1925年）。

③例如，“湖南新闻记者代表大会，”（1927年3月）曾提出“统一宣传案”，并做出相应的决议。

④《敬告本报读者》，《向导》第十五期。

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宣传问题的决议案》。

用，第一是宣传鼓动作用，第二是组织作用^①。很多党所领导的工农刊物，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团和工人的领导机关还提出运用各自的报刊建立和发展青年团和工会组织的要求。

别的报纸是否只是空发议论呢？那也不尽然。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所宣传的某些思想主张（除去那些夸饰之词），确也求其实现的。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宣称：“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实行也近。”从这里可看出他要报刊宣传转为实际行动的设想。他领导的革命党所出版的报刊，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武昌起义后的政治斗争中，都表现出干预实际运动的倾向。改良派比不上革命派，但是他们的报刊，也并非不起这样的作用。例如，清末维新派曾把报刊作为联络同道、建立学会和推动维新运动的工具，他们认为，要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就得“开风气，开知识”，就得聚集力量，建立学会，而这一切又须从办报开始。陈炽提出：“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②康有为正是根据这种想法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的。梁启超也说：“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③他们以后所出版的报刊，更有和革命派争夺群众，左右政治局势的强烈企图。

所以，从广泛意义上讲，我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对实际运动是起有某些指导作用与组织作用的。但是，它与《向导》等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相比，又有原则区别。中国共产党以不断开展广大的群众运动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基本手段。因此，它不仅一般在一般情况下注意运用报刊宣传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活动；而且在群众运动蕴酿时期，就非常重视运用报刊推动运动的顺利发展。这就是，一方面要为运动分析形势，指

① 《中国共产义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1925年）。

② 转引自《康有为自编年谱》。

③ 《梁启超致夏穗卿》（1895年5月）。

明方向，制定行动纲领与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又要深入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斗争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通过报刊对群众运动进行具体指导。当然，当时党的报刊对这项工作不能说做得很完美，但确是按这个方向进行的。所有这些，无论是改良派报刊或者是革命派报刊都无法做到。资产阶级革命发动了那么多次的武装起义，参加了那么多的政治斗争，可是从没有看到他们运用报刊对这些运动进行具体的系统的指导。他们曾很自觉地认识到报刊的宣传作用——将思想学说、政治主张“输灌于人心”（孙中山）、“浸渍于人心”（梁启超），而对报刊具体指导政治运动问题，也许还从未真正思考过。

此外，关于报刊宣传为革命服务的观念，看来并非无产阶级政党报刊所特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报刊也是较为鲜明的。可是二者相比，不仅内容有别；在其彻底性方面彼此也很不同，前者大大超过后者。现在再来看看，这些新的报刊观念，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面貌，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化^①：

它们鲜明地站在广大工农一边，捍卫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要求，广泛报道他们的斗争活动，工农写的稿件经常登报。影响所及，在进步新闻界中，支持工农报道工农，一时蔚为风气，有的新闻组织曾为此做出专门决定^②。工农报刊也在这时大量兴办起来。目前所知，在不到七年之内，党所出版和在党影响之下的工人报刊，就有近百种之多，所有这些也都是前所未有的。

它们在中国报刊史上，第一次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鲜明旗帜，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斗争策略。在各个运动中，它们总是站在宣传战线上的最前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

① 当时党领导下的报刊面貌的变化，也存在一些复杂情况，并非全然可以从报刊观念中找到思想根源。

② 湖南新闻记者大会在1927年3月，根据谢觉哉同志的提议，决定各报开设专栏刊载工农消息，“篇幅每天至少须占大张半版”（1927年3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